

·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

XIANQIN LIANGHAN XUESHU SIXIANG LICE

先秦两汉学术思想蠡测

蒋重跃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先秦两汉学术思想蠡测

蒋重跃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秦两汉学术思想蠡测 / 蒋重跃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12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ISBN 978-7-303-13368-0

I. ①先… II. ①蒋… III. ①学术思想—思想史—研究—中国—先秦时代②学术思想—思想史—汉代
IV. ①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76152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70 mm × 230 mm

印张: 18

字数: 268 千字

版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策划编辑: 刘东明

责任编辑: 刘东明

美术编辑: 毛 佳

装帧设计: 毛 佳

责任校对: 李 茵

责任印制: 李 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何兹全 龚书铎 刘家和 瞿林东 陈其泰
郑师渠 晁福林

主 任 杨共乐

副主任 李 帆 易 宁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卫东 王开玺 王冠英 宁 欣 汝企和
张 皓 张 越 张荣强 张建华 郑 林
侯树栋 耿向东 梅雪芹

出版说明

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百余年发展历程中，历史学科始终占有重要地位。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今天的北师大历史学院业已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基地，是国家“211”和“985”工程重点建设单位，首批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予权单位。拥有国家重点学科、博士后流动站、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一系列学术平台。科研实力颇为雄厚，在学术界声誉卓著。

近年来，北师大历史学院的教师们潜心学术，以探索精神攻关，陆续完成了众多具有原创性的成果，在历史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上连创佳绩，始终处于学科前沿。特别是崭露头角的部分中青年学者的作品，已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为了集中展示北师大历史学院的这些探索性成果，也为了给中青年学者的后续发展创造更好条件，我们组编了这套“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希冀在促进北师大历史学科更好发展的同时，为学术界和全社会贡献一批真正立得住的学术力作。这些作品或为专题著作，或为论文结集，但内在的探索精神始终如一。

当然，作为探索丛书，特别是以中青年学者作品为主的学术丛书，不成熟乃至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还望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编辑委员会

2010年3月

前 言

学术思想史，对应的英文是 intellectual history，即智力的历史，知识的历史。作为名词，intellectual 又译做“知识分子”，中文习惯叫做“学者”。所谓学者，乃从事学术者也；学术的核心，乃思想也。换个说法，学术思想史既是学者的历史，又是学术的历史，更是思想的历史，它们是三位一体的，相互渗透着、相互统一着。这里的“思想”一词，当然可以包含哲学这样超越的、反思的内容，也可以包含与之相关的具体的、实际的社会历史的思维活动。无论如何，它是指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特别是在具体的学术传承中学者的智力活动的生动发展过程。基于这种理解，所谓先秦两汉学术思想史，就是指先秦两汉时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学者的智力活动，即学术和思想的发展史。

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说过，“战国者，古今一大变革之会也”。（《读通鉴论》）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这一历史上的奇观，学者们激发出无与伦比的创造活力，对关乎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本身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两汉时期，学者们根据时代需要，在消化吸收先秦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展开了精致的学术研究活动，为中国文明在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本书所讨论的，恰恰是这个时期学术思想发展中的若干问题。

这里的二十一篇文章是我从过去发表的有关成果中筛选出来的，大致可以分为四组。第一组七篇，是围绕着黄老之学这个主题展开的；第二组六篇，是有关韩非思想的；第三组三篇，可以算作讨论王朝统治观念的；第四组五篇则专门展示春秋战国和两汉时期的重要的历史思想。

20世纪70年代马王堆汉墓帛书出土以后，黄老之学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不过，它产生于何时？何地？为何人所创？它的原初形态是怎样的？它究竟是老子思想的变形呢？还是老子思想和黄帝思想的结合呢？如果是后者，那么，黄帝思想又是什么呢？这些成了黄老之学研究者必须回答的问题。我清晰地记得，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和许多人一样，为马王堆汉墓的考古发现而激动不已，报刊上关于黄老之学的讨论也时时让我感受到了这些问题的吸引力。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南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凭着这种兴趣，毅然选定黄老之学作为学位论文的题目，试图通过系统的研究给这些问题以解答。此后，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一直持续到90年代。我最初的看法是，黄老之学是打着黄帝和老子旗号的老子思想的变种，它产生于战国中期的齐国，它的基本内容保留在稷下学的成果《管子》一书中。后来我又渐渐地感到，黄与老有所不同。根据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指》中的论列，“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是道家学术思想的大体框架和基本构成；而道德和形名的结合才是它的核心内容。可见，这个学派是讲求国家治理的，特别是重视治官的，这与老子有所不同。老子虽然也讲治理大国，可毕竟缺少形名之学的内容，对于名，是持否定态度的；也没有阴阳儒墨的框架和结构。由此我倾向于认为司马谈所说的道家应该是指黄学，是与老学不同的另外一个派别。那么，哪部著作是黄学的著作呢？经过考察，我确信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经法》等四篇古佚书当为黄学的著作，学者把它定名为《黄帝四经》是有道理的。不过，我还认为，比《黄帝四经》还要古老的是《管子》，其中有大量内容涉及道德与形名的结合，更有明显的“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内容，因而应是目前所知“黄帝之言”的最初的重要物证。这组文章中有几篇从文献比对、历史背景分析等方面作了说明。与此相关，《申子》、《尹文子》在学派活动和思想流传上究竟应该如

何定位？《韩非子》与黄老或黄帝之学有怎样的关系？我在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对这些问题作了一定研究，提出了自己不成熟的看法。

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上半期开始，《韩非子》就是我喜欢阅读的一部著作，韩非思想也成了我感兴趣的对象。不过，当时只能在新出版的法家著作选本和报刊杂志上读到《孤愤》《定法》《五蠹》《显学》等著名篇章。由于与黄老之学关系密切，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韩非思想又成为我研究和思考的重要课题。20 世纪 80 年代末，我的《韩非政治文化观片论》一文发表。这篇文章记录了我那时所关心的问题以及对韩非思想的理解，有些观点在我后来的论著中仍然有着一定的影响。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我来到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老师指导下，选定韩非思想作为毕业论文题目。1998 年我的博士论文《韩非子的政治思想》完成，并顺利通过答辩，2000 年作为北师大博士文库论文得以出版。在博士论文撰写过程中，我曾把相关的几个专题研究以单篇论文的形式交给学术期刊发表，这就是本书中关于韩非道理论、人性论及其对传统观念文化的批判这三篇文章的由来。2008 年，我接受了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的约请，为“历代名著精选集”撰写了《韩非子》（注评）一书，2010 年出版。当年，我又把写作期间以及《韩非子的政治思想》出版十年以来关于韩非思想体系及其矛盾的思考整理出两篇文章发表。这两篇文章代表了我在新世纪最初十年中对韩非思想的认识。

第三组三篇文章涉及以下两个问题：其一，从知性上说，变法和定法是战国法家思想中相互矛盾的观点。怎样理解这个矛盾呢？其二，禅让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重要学术公案，又是影响深远的历史文化现象，禅字的禅让之义究竟来源于何处？禅让说究竟是起于墨家的发明，还是儒家的倡导？世纪之交的几年里，我曾寝馈其间，苦思冥想而不得其解。经过艰苦的考索，究竟取得了一点进展。

《论法家思想中的变法与定法》初步认为，法家的变法和定法主张是古代中国人对法律变动性和稳定性这对根本矛盾的某种认识，既是对立的，又是同一的，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理论意义，值得重视。

长期以来，在有关禅字的禅让之义来源的各种观点中，禅祭说居于统

治地位，而螭蝉说虽偶尔有人提及，却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众所周知，蝉形是商代青铜器上常见的主题。考古发现，从殷商到汉代的墓葬中，许多墓主人口中就有蝉形玉含，今人推测应与祈求再生有关。如果确实，那就是取蝉的蜕变的喻意而形成的宗教观念。由此进一步推测，古人可不可能用这个隐喻，来表示某种特定形式的王朝更替呢？《说禅及其反映的王朝更替观》一文尝试运用小学和文献资料对这个问题进行考察，希望有所突破。禅让说是关于最高统治权转移的学说，它与天命有德思想相一致，应该是儒家的发明。墨家讲求选官任贤，虽与禅让有所重合，但在思想体系上毕竟未能提供必然的前提条件，《“歷数”和“尚贤”与禅让说的兴起》一文总结了这项研究的成果。

总之，这三篇文章都以王朝统治观念为论题，姑且排在一起。

第四组五篇文章，都是关于历史理论的。2001年起，我参加了业师刘家和先生主持的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科研项目“中西古代历史、史学及理论比较研究”，担任第三子课题“中西史学理论比较研究”负责人之一。这几篇文章都是在先生亲自指导下完成的，第一篇还是与先生合作撰写的，第五篇则是在先生从前著作的基础上，由曲阜师范大学的李景明教授和我一起执笔完成的。五篇文章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通过研究，挖掘出先秦诸子的主要几家对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展有怎样的贡献，以及汉代公羊学家怎样把古老的历史思想发展成为有终极目标、有发展阶段、甚至连后世西方历史哲学家也要叹服其系统完整的历史哲学的。

通过这样一个简短的巡回，我发现，二十多年来，我的学术研究竟然经历了以下几个变化。一是关注点的变化。第一组文章发表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2000年之前。这十几年里，研究侧重在诸子文献的真伪和学派划分上面，这是由于传统目录学的影响所致。世纪之交以来，兴趣逐渐转向思想本身的研究上来，体系及其矛盾成为关注的焦点。二是研究方法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比较注重目录学提供的线索，习惯于从文献比对上对研究对象进行考察。进入21世纪以来，逐渐向语言和概念分析延展。文字考证、文献解读、概念及概念间关系的分析成了更热衷的方法。三是认识特点的变化。过去习惯于大体把握，难免笼统和模糊。新世纪以来，逐

渐自觉地把追求阅读理解的精准、思想的清晰作为努力的方向。四是论说形式的变化。从前习惯于类比，以求同比异来判定学术公案。近些年来，开始自觉地把实证和思辨结合起来。五是研究态度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意气风发，胆子也大，有时还比较急躁，难免有虚骄和空疏之失。近些年来，阅读文献越来越谨慎小心，研究中总要考虑材料是否扎实可靠、说理是否合乎逻辑。上述这些变化，反映了我的成长和进步历程。我希望在将来的时光里，我还能保持进步的状态。当然，我更希望，我还能像现在这样做自我反省，还能对自己有一个比较冷静客观的认识。如果是这样，那才是真正值得庆幸的。

《说文·瓠部》：“瓢，蠡也。”段注：“以一瓠剡为二曰瓢，亦曰蠡。”古代有“以蠡测海”的成语，比喻以小度大，不自量力。先秦两汉学术思想是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精神之源，其广阔深厚唯大海可以方之。而我的这几篇小文，仿佛是匆匆舀上的几瓢海水，实在微不足道，对于测度大海来说，更是不敢企望的。不过，尽管如此，为了能舀上这几瓢，我毕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多少也还领略到了大海的风貌。我之所以不揣谫陋，愿意把这一点感受呈现于此，是希望能够与专家学者和广大同好们进行交流，以得到有益的批评和指教。

目 录

第一编 从“黄老之学”到“黄帝之学”

申子之学的历史地位	3
如何确定黄老之学的最初作品	14
黄老之学源于秦楚说质疑	22
《尹文子》新证	30
韩非子与齐国黄老之学	40
《管子》的主流属“黄帝之言”	51
关于“黄帝之言”的两个问题	57

第二编 《韩非子》研读

韩非子政治文化观片论	75
韩非的道理论及其在诸子天道观中的地位	81
孟子荀卿韩非子对人的本质的认识	99
韩非对传统观念文化的批判——兼论其政治实用主义本质	111
历史的变革与思想的矛盾——对韩非思想中的矛盾的再思考	122

从词语的不同内涵看古代的政治变革——试析《韩非子》的忠贤仁…… 130

第三编 关于王朝统治观念的思考

论法家思想中的变法与定法 …………… 141

说“禅”及其反映的王朝更替观 …………… 154

“歷数”和“尚贤”与禅让说的兴起 …………… 170

第四编 论历史思想的理论意义

先秦儒家历史理性的觉醒 …………… 185

试论道法两家历史观的异同 …………… 197

五德终始说与历史正统观 …………… 214

董仲舒《春秋》学的通史精神初探 …………… 233

何休《公羊解诂》的历史哲学 …………… 250

后 记 …………… 272

第一编

从“黄老之学” 到“黄帝之学”



申子之学的历史地位^①

申不害究竟应该属于哪家学派？其思想的历史地位又将如何评定？长期以来，由于先秦文献几经劫难，诸子之学的历史面貌总是若明若暗、扑朔迷离，再加上人们沿袭旧说，以为申子属于法学早成定论，没有再行推敲和商兑的必要了，所以，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受到认真的对待。最近一个时期，我在涵泳白文、爬梳史料的基础上，着重对子遗的《申子》篇章进行了一番仔细的整理和琢磨，发现申子之学远绍老子，近承稷下黄老之学，是道家策略思想的重要发展阶段。本文从三个方面总结了这项研究工作的成果，今胪列于后，敬请方家教正。

一、不是法家而是道家

治战国学术思想史，很容易碰到这样的问题：老、庄、申、韩何以列入同传？这是不是出于太史公一时的疏忽？事实上，司马迁记百家之学最得乃父心传，对诸子分传记载都是按照学派思想的发展和继承的标准进行的，如《管晏列传》和《孟子荀卿列传》就是根据齐学及其与其他学派的关系这个标准划分的。那么，由此看来，老、庄、申、韩同传，是不是也可以给人以启示？换言之，可不可以设想庄子和申子分别代表着老子以后道家学说的两个发展潮流呢？

文献证明，西汉初期以前，申不害并没有被视为法家的同道。《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申不害……学术以干韩昭侯。”这里所说的“术”，就是韩非早就概括的“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韩非子·定法》）。它不像法那样必须公之于众，使“境内卑贱莫不

^① 此文原题如此，1988年在《文献》杂志第3期发表时改为《申子非法家辨》，今予恢复。

闻之”（《韩非子·难三》），而是恰恰相反，只能“藏之于（君主）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即使是“亲爱”、“近习”也“莫之得闻也”。据此一端，便可断定，申不害所学的术与法家所标榜的法不可同日而语。

韩非曾潜心分析了申不害改革的得失成败，对单纯的术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一针见血地指出：申不害相昭侯，“托万乘之劲韩，十七年而不至于霸王者，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韩非子·定法》）可见，说申不害是法家，在韩非那里就根本通不过，这是毫无疑问的。

对诸子之学分家命名始于司马谈。在其所著《论六家之要指》中，道、法两家泾渭分明，各有侧重，不可能浑然合一。如“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曰严而少恩”。联系到李悝、商鞅之流重农重战、慎赏重刑的法家政策，和“刑生力，力生强”的极端法治主义指导思想，可以体会到司马谈的评断是合乎实际的。然而一直为人误认做法家的申不害，恰恰是用术不用法，主张君主要宽厚无为，使天下“近者亲之，远者怀之”^①，与法家主张完全相背而驰。至于司马谈在《要指》中指出法家“正君臣上下之分”，则是站在道家的立场上对这一思想内容的肯定，而不是主张所谓“正君臣上下之分”为法家所独有。战国时代，诸子百家所处心积虑的，都是如何向统治者提出他们以为最佳的统治方案，儒家鼓吹“正名”、墨家标榜“尚同”、道家服膺“无为”、阴阳家倡导“明堂月令”哪一个不是要“正君臣上下之分”呢？如此看来，用“尊君卑臣、崇上抑下”^②来断定申子之学的法家性质，并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诚然，申不害确实主张“君必有明法正义”、“圣君任法而不任智”^③，貌似法家，但仔细推敲，可以看出这仍然不是申不害思想的本质。因为，在申不害那里，法是用来作为术治的辅助手段的，这就决定了他在论述术治时不能不谈到的作用。另一方面，诸子百家在争鸣中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现象极为普遍，每一学派不可能不囿有他家个别词句甚至部分思想内容。面对

① 《申子·大体》，见《群书治要》卷三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5。

② 刘向《别录》，见《史记·张敖列传》索隐，2773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③ 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五十四，汪绍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这种情况，如果不抓主要矛盾，反倒专注意那些支流末节，那就会治丝愈纷，扰乱视线，阻碍学术研究的进步。

在关于这个问题的诸多错误看法中，最典型的莫过于用习惯上的“申韩”和“申商”连称来判断申子之学的属性了。本来，申韩连称只是就两者皆“源于道德之意”而言的。相比之下，韩学更显复杂，在糅合道法两家的基础上，更侧重于法家。所以，不能贸然将申韩连称目为同属一个学派的凭据。至于申商连称，更无牢靠的基础。申不害、公孙鞅在战国后期人们的心目中早已是“两家”（《韩非子·定法》）。西汉初年，由于受道法合流思潮的影响，人们才习惯申商连称，如司马迁谓“贾生、晁错明申商”，但却没有认为战国时代申商同道。但稍后的桑弘羊却已经认为申商同道了，他说：“申商以法强秦韩也。”（《盐铁论·申韩》）这与申子用术不用法的事实是相左的。用汉人的习惯来断定战国诸子的学术地位，就申商而言，可能肇始于西汉末年的刘向。他在《新序》中说：“申子之书……号曰‘术’。商鞅所为书号曰‘法’。皆曰‘刑名’，故号曰‘刑名法术之学’。”^①东汉班固也袭用这一做法，在《汉书·艺文志》中把《申子》正式著录于法家类。于是问题便变得复杂起来。

近人大多主张，《论六家之要指》对道家学派的评述，概括了老子之学和黄老之学的全部内容，它从虚无为本、因循为用、形名端合、复返无名、形神相葆诸方面，展示了道家无为思想的精神风貌，经过逐条的核校、参较，可以确信，申子之学只能是道家之学。

根据《论六家之要指》的评述，道家讲求术治，其本质是“无为”：“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羨，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史记·太史公自序》）申不害也直称其所学为“术”，强调圣君“任数（术）而不任说”，主张“去听无以闻则聪，去视无以见则明，去智无以知则公”（《吕氏春秋·任数》），与上述道家思想毫无二致。

道家也讲“因循”，“其术以因循为用”，内在精神还是“自然无为”，

^① 刘向：《新序》，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集解，2146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